

庙会与武汉城市旅游经济

□

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梁方

武汉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留下一批名扬三楚的寺庙观阁和附丽于宗教文化的庙会文化，对这批遗产的深度系统开发，将有利于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

庙会，作为一种集商贸、艺术、游乐等多功能于一身的经济——文化活动，二十多年前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宽松的社会环境中，由潜行而后大行于名山古寺；十余年来，在“三个有利于”的现代化建设中，它进一步强化了综合功能，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为此，我们有必要以新的视角对庙会进行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考察，在传统庙会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它的物质载体（抓“大”），丰富它的精神内涵（抓“新”），促使它在现代转型中由必然走向自由，由自在走向自为，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粗放”走向“集约”，从而成为城市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

庙会最初是奉祀祖宗、神佛或前代贤哲的庙事活动，因庙事活动而众人聚集，为满足聚会众人之消费于是形成集市，这个集市通常在庙事活动之日、在寺庙内或附近展开，其后形成定制，叫做“会”（迄今，北方的百姓仍然习惯将集市称为“会”，如“骡马大会”）。后来，“会”成为寺庙兴盛香火的手段，一般著名丛林均以办“会”为已任，并不断吸纳民间文化会和摊贩商社参加，于是因庙成会，因会成市，宗教信仰活动、民俗文化活动与商品交换活动互动乃至多赢，庙会遂成为中国市集形式之一，大唐以降而盛焉。至明清，庙会组织更自觉地运用了民间的经济资源，与商品交换密切相关的社会阶层也进入庙会组织系统。光绪六年北京关帝庙《题名碑》中，“商人艾五”赫然与官宦乡绅相比肩，即是名证。商业因素的广泛介入，无疑是庙会不断开放的产物，也是庙会长足发展的驱动力。与此同时，各地庙会因不同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相对固定的特色并游离于单纯的宗教信仰活动，庙会几乎成为民间不可或缺的盛大节日。

对传统庙会作历史的考察，笔者认为，城市庙会因其深透的精神内涵和多姿的物质外壳为市民所好而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庙会作为中国人独有的物质——精神活动产物而具有整合的系统性；庙会展示的一切都是在传统基础上新的发展，它既是过去的经济——文化的产物，又是当今经济——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超时空的统一，表现出动态的承传性；庙会其所以历经千年兴衰而不绝于缕，并大行于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于它的自组织机制能不断促进开放、交流、传播，故能不断吸纳社会大系统给予的一切积极的动因，因此，庙会还具有绝对的开放性。这些特性正是我们研究庙会产业化发展的根据，也是我们促使庙会的现代转型的出发点。

仅以武汉的城市庙会为例，明成化以后，三镇鼎立并形成九省通衢格局，商业经济的发展、城镇文化的汇聚，为三镇的寺庙观阁及庙会注入了新的活力，至清，三镇庙会更名噪三楚。

徐志的《汉口竹枝词》就记录了雍乾之际汉口庙会之一斑：“争将故事演新妆，枷锁高跷亦太狂。赤日烧空人泛蚁，年年六月赛关王”（指关帝庙每岁六月的关王会的演剧）。嘉道间，诗人笔下的庙会更加丰富多彩，叶调元竹枝词载：“沈家庙里戏醉神，一节入官二百文。求福人多还愿众，戏台押得一包银”、“四宫殿与存仁巷，灯挂长竿样样全。夹道齐声呼‘活的’，谁家不费买灯钱”（四宫殿有火神庙，且以灯市闻名于江汉）、“岳神诞日进香来，人山人海挤不开，名是敬神终为戏，逢人啧啧赞徽台”（指东岳庙三月二十八日前搭徽台演戏）、“每逢五月赛金容，设立行宫大路中。木刻龙头安座右，划船锣鼓演

村童”(五月三宫殿天符神出庙,民众欢娱,汉水龙船竞渡)。咸同年间,七月盂兰会又大行于三镇,此会“汉阳古寺号归元,僧众焚修不出门。进项千金当七月,为他每夜济孤魂”(沈子星《汉口竹枝词》之九),时归元寺庙会收益之高,为其他寺院艳羨。

三镇的庙会,历史之悠久,影响之深远,当以洪山宝通禅寺的庙会为魁首。洪山“水共山”之地,由于山川形胜,宋元以降,登山揽胜、赏石观树、祭神祀福已成江夏文人之雅好,并深得久居闹市市民之心仪:“……东行过去洪山寺二里许,折北穿小径可十里,度松林涉涧,涧水澄沏,深处可泛小舟……松柏竹树之阴森,有蒙密时,风和日丽,草木之葩烂,然香气拂拂袭衣,禽鸟之声不一类……”(明,杨士奇《游东山寺》),连明公安派之“班首”袁宏道也曾“醒却酩酊梦,来作冷石游……”清季,揽胜继而发展成为江夏特有的上元节登高踏青的岁时节令习俗:“寻芳人共春携屐,习静僧常昼掩关……”(清,崔应阶《上远同友游洪山寺》)。这个习俗与洪山的庙会共同构成三镇独特的庙会文化,成为武汉城市旅游的滥觞:“东家姊妹约西邻,道是相邀去踏青……宝通寺里去求神,信手抽将签一根……甘蔗一根堪作杖,无人不道看花回”(蔡寄鸥《洪山竹枝词》)。

据《武汉市志·社会志》载,清代,每年阴历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天齐大帝(注:即黄飞虎)诞辰日,“武昌宝通寺则办‘天齐会’,绅商仕女前往烧香还愿,春游寻胜。此日又称‘甘蔗节’,说是日吃甘蔗可以‘得福消灾’”,迄今,民间还流传着“三月二十八,洪山吃甘蔗”、“有钱的吃甘蔗,无钱的吃麻花”等俗语。对洪山宝通寺庙会的记述还散见于清隽华馆生的《鄂垣竹枝词》及素公的《洪山竹枝词》里,足见影响极一时之盛。直到民初,庙会仍是“从俗联翩游古寺……无边车马喧阗甚”(汪楚辉,《游洪山》)。时《旅行杂志》也载:“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是黄飞虎生日,那天,武汉三镇善男信女要来拈香拜佛,不拈香的也趁暮春光景来看看热闹,东岳庙后不远处是洪山宝塔……可以登临,塔上题咏很多,记得有一联句是‘伊谁临绝顶,有客惜斜辉’”(卷二十二,金休,1948年7月)。宝通寺的“天齐会”深深地影响着三镇市民的社会生活,显示出近代城市庙会更多地含蕴了更广泛的市民的更迫切的物质——精神需要,从而淡化了“神”的特点,更多地展示了“人”的习性。遗憾的是,由于国运不济,庙会多舛,起于明、盛于清的宝通寺庙会1938年终因日本侵略军飞机空袭而为国民政府禁办,“从此天齐会、甘蔗节乃废”(见《武汉市志·社会志》)。

由此可见,古往今来的庙会均以鲜明的社会性、系统性、承传性、开放性长期作用于特定区域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风民俗、民间商贸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其综合功能愈来愈强烈地辐射出来,使它注定成为阐释中国社会总体特征的最有力的实证之一。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庙会以其独特的民俗风情

而享誉海内外。明人笔记《谈经》载,北京城隍庙庙会甚至吸引了外国游客和商人:“碧眼胡商,飘洋番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就连美国总统尼克松也不能“免俗”,当年他出访上海,还专程冶游上海城隍庙。

建国后,三镇庙会少有发生。1963年,开始走出“三年自然灾害”阴影的三镇曾在汉阳归元寺举办过一次庙会,庙会之盛,不仅在于市集上有了较丰富的小商品、食品;还有了形式多样的文艺汇演……反映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的社会,依然充满了信心。同时在庙会活动中,人们开始嗅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火药味。随之,中国的庙会终于全部销声匿迹于阶级斗争的狂飚之中。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赋予庙会以迅猛的发展。2001年春节,武汉以“庙会”为名的市集活动就有江夏庙山庙会、青少年新春庙会(汉口青少年宫)、新世纪汉阳文化庙会(归元寺)。庙会期间,仅归元寺初一、初二游客达20余万人,每日游人祈福后的烟火灰等余烬几达十余吨,门票收入创历史新高。庙会已成为各地开发旅游经济的突破口,一方面它的一些地区取得较好的两个效益,以1998武当国际旅游节“十大活动”为例,仅“武当三月三庙会”的三天时间,就接待海外旅游团28个、国内旅游进香团30个,共计8万多人,收入2000多万元。整个旅游节,接待40多万人,比1997武当庙会同期增长40%,武当庙会遂成定制;另一方面在一些地区的运作中,还存在着制约庙会向现代化转型和规模化发展的障碍。有的陷入“无本之木、拔苗助长”的盲目状况,举凡庙会都因其深远的传承性而具有社会性和可操作性,绝非对任何文化集会或经贸集会冠以“庙会”之名就能“立竿见影”,一个徒有虚名的“庙会”没有不流产的。除此之外,还有的一任庙会“旧瓶旧酒;放任自流”。一个不能吸纳和包容新的理念、新的物质——精神成果的庙会,势必封闭、萎缩而被历史淘汰,更何况在当前高速运转的社会转型期间。

庙会是一定历史条件下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社会心理的产物,只有顺应“天时”,即顺应时代的变迁,庙会才具有新的生命力。为此,在研究转型期的庙会和促进庙会的转型时,一定要站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多元化的基点上,有针对性地发掘传统庙会中与社会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社会资源,并按市场规律和人类共同的先进文化理念营造现代庙会,才能避免盲目性,增强主创性。

为此,要从物质层面上拓展庙会,以更“大”的规模尽庙会之“地利”。庙会赖以发展的载体是“地”,“地之利”表现在自然景观的优雅可登可临、人文景观的深邃可鉴可赏、交通往来之便利可聚可散、购物游乐之随意可进可出……北京最悠久的城隍庙庙会其所以衰落,就是因为“地”不便利。清雍正之期隆福寺庙会崛起于东四牌楼、护国寺庙会崛起于西四牌楼,均因两庙会地处内城,区位优势,交通便利,人气鼎盛,故发展迅



猛。到民国,隆福寺又增加了庙会的时间,几乎每天都有庙会,于是尽占“天时”、“地利”,其影响又盛于护国寺,直至解放后。

庙会既不能速成,又不能短视,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在历时承传中形成的“地利”是它现时传播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它走向规模化、产业化的前提条件。要将庙会做“大”,首先要将庙会的“地”做大。报载“十五”期间,武汉的归元寺将在现有面积上扩大一倍。报又载,今年春节归元寺庙会期间,市领导特地来到归元寺现场办公,再次强调了加快宗教文化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归元寺及周边扩建及以景代市的思路。笔者以为,根据归元寺庙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借鉴各地的经验,扩建项目还要考虑到以“俗”立市。庙会的发展在于宗教文化与民俗文化及民间商贸的互动,因此要以“民俗”夯实归元寺庙会之“地基”。如同北京的天桥、厂甸,天津的“沽上艺苑”一条街,乃至南京夫子庙,上海城隍庙……无不因以“俗”立市而为雅俗共赏、中外乐见。作为湖北省会的武汉市,更应以荆楚民俗事像构造可游、可赏、可鉴、可乐的庙会基地,以形成可进入国际旅游市场的宗教文化旅游品牌。所谓“以俗立市”,即在扩建的项目中,为湖北、武汉的老牌商号、民间剧团、汉味说唱、杂技魔术、楚剧汉剧、天河皮影、黄孝花鼓、汉绣风筝、剪纸泥塑、古玩书画、土家跳丧、古楚乐舞乃至民俗博物馆……都留下一席之地;其建筑风格也要考虑汉味特点——老汉口的吊楼、老武昌、汉阳的两层三进、白墙灰瓦、斗拱飞檐……为其如此,汉味庙会才能在做“大”中尽地之利,奠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更要从精神层面上赋予庙会更“新”的文化理念,即以当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张扬庙会之“人和”。比

如可发掘传统庙会中符合当代“以人为本”观念的一些伦理资源,以形成现代庙会的新主题。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这是21世纪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历史上的宝通禅寺就遵循如此准则,它之所以“俨然一大丛林”而成为庙会之所,是因为早在北宋,它就有对山林“禁樵采,封植培护”(宋,赵淳《东山赋》)的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即使在日伪之期,山林“砍伐殆尽,惟余宝塔”,僧人们仍然坚持“封植培护”,不久丛林即“大者挺然干霄,小者丛生攒立”(同上),为三镇留下了一片绿荫。“放生”也

是中国传统习俗,它与佛典中以身饲虎、以身饲鹰的行为、观念如出一辙。由于佛教中国化,佛典的“不杀生”与民间的“放生”共同作用,佛诞日(阴历四月初八),僧俗两界往往共同举行“放生会”,宝通寺、归元寺至今还流传着不少这类脍炙人口的故事。

对三镇庙会的传承与开新作系统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庙会是武汉宗教文化旅游可供开发、利用的丰富的经济——文化资源。

21世纪,当我们以庙会为基点,关照到人类社会的生息时,我们还会感到“法自然”(道教)、“慈悲”(佛教)、“博爱”(基督教)、“仁者爱人”(儒教)……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可供共同吸取、并由此形成“全球伦理”的资源。那么,以此理念赋予武汉城市庙会以新的主题,在上巳节(阴历三月初三,民俗节日)、东岳大帝诞辰日(阴历三月二十八,道教节日)、佛诞日(佛教节日)举办庙会,在三山(洪山、蛇山、龟山)放飞珍稀飞禽且植树造林,在两江(长江、汉水)、两湖(东湖、月湖)放养珍稀水生动物,在两庙(宝通寺、归元寺)一观(长春观)同时组织多种形式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民间商贸的旅游观光活动,应该多么壮观……这样的庙会不仅极三楚之盛,还能广泛吸引海外客人,这也正是创建山水园林城市的需要,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存城市的需要。

现代社会生活需要庙会转型,庙会的转型是以更“大”的规模为其体魄,以更“新”的先进文化为其灵魂,以更开放的自组织系统为其行为方式,如此天时、地利、人和,武汉的现代庙会才能成为城市宗教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责任编辑 陈卫民]